

反思現代文明的脆弱——

回應薩斯教授

Reflection on the Fragility of Modern Civilization: A Response to Professor Sass

關啟文

Kwan Kai Man

Abstract

In my response to Prof. Sass, I first elaborate some points on which we agree. For example, I find the five crises of modern civilization discussed by Prof. Sass to be quite real, and I believe that this points to the fragility of modern civilization. I then critique the Enlightenment ideology of progress and argue that we need to prepare for the possibility of a cultural decline. I also agree with Prof. Sass's emphasis on both the human potential for creativity and the human capacity for self-destruction. This contradicts liberal optimism about

關啟文，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教授，中國香港。

Kwan Kai Ma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ong Kong.

《中外醫學哲學》XVIII:2 (2020 年)：頁 45-5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XVIII:2 (2020), pp. 45-50.

human nature and raises questions about our internal and spiritual resources. I support Prof. Sass's critique of modern society's obsession with GNP (Gross National Product) and agree that the concept of a GHP (Goss Happiness Product) is a better criterion for a good society. However, I believe that we must overcome even the vestiges of hedonism by affirming the intrinsic value of an objective moral order that transcends human happiness. In the end, in the face of the possibilities of disasters and the collapse of modern civilization, we need to return to our basic communities, such as family, and emphasize the cultivation of virtue.

當新冠病毒仍然在全球肆虐之際，薩斯教授（Prof. Hans-martin Sass）撰文論到新冠病毒也攻擊群體和政體，內容豐富且發人深省，筆者在這裡只能簡略回應，激發更多人深刻反省現代文明的限制。

1. 為現代文明的災難作準備？

新冠病毒的疫症到現在還未能完全控制，令人驚奇的是，在一向被視為「先進」的歐美國家，問題也同樣嚴重，且有每況愈下之勢。在全球交通基本上被封鎖和不少城市封城的情況下，很多國家的經濟嚴重受損，而現代文明的「驕傲」很大程度是建基於經濟發展上。這場疫症讓我們明白，一個肉眼不能見的小小病毒，就能對我們引以為傲的現代文明造成重創，其脆弱可想而知。

薩斯教授談的不單是新冠病毒，而是更廣泛現代文明面對的五大危機：一、全球疫症和生化戰爭；二、電力風險和電磁衝擊；三、對紙張承諾（如紙幣）的信心危機；四、反叛與鎮壓的風險；五、領域混淆的風險，如把虛擬領域與真實世界混為一談。請讀者自行閱讀細節（Sass 2020，21-26），筆者就感到他提到的一些可能性相當真實，例如一些恐怖分子或狂人可以發起電磁衝擊波的襲擊，那時汽車癱瘓，飛機從天上掉下來，所有溝通中斷，最終人們可能要在高樓大廈中餓死，或為食物互相廝殺！薩斯教授把「舒適、高度複雜的」現代文明比喻為「大象」，但這大象的

「腿卻是黏土做」的，且「站在沙上」！（Sass 2020，24）（這些都是源自聖經的隱喻。）

2. 進步的迷思

我相當同意，現代社會的風險很真實，不能掉以輕心。我們也不應以為現代文明的穩定是必然之事。新冠病毒令我們的增長止步，這已足夠令我們焦慮，因為啟蒙運動以後，科技就是全能的「神」，而不停的經濟增長則成了最高的善——也是現代人的神話。但經驗似乎告訴我們：無窮增長的樂土只是烏托邦。格瑞爾（John Michael Greer）的近作《進步之後》就指出，「在那些要求無止境的經濟增長的政經意識形態，和一個有限的行星的硬性限制之間，存在著災難性的不吻合。」（Greer 2015，1）在當代社會，增長、進步（progress）已成為一種公民宗教，為我們提供終極價值、人生意義和委身目標。但他相信若仔細檢視各種證據，無止境進步的希望已可宣判死亡，所以進步這種公民宗教只是一種虛假的替代品——可稱為「進步教」。

格瑞爾相信一種循環的歷史觀，認為每一個文明的進步總會慢下來，且停滯、然後衰退——我們工業文明也將要過去。無止境進步的幻覺難以驅除，是因為我們碰巧在這個階段找到大量便宜能源（如化學燃料），這令我們在過往幾個世紀能不停的進步，但這種便宜能源總會耗盡，所以進步總有一天會停下來，然後開始衰退。我欣賞格瑞爾對進步教的批判，我不肯定他的悲觀預測是否一定實現，但現代文明的確需要反思，不應把「進步」視作唯一和最高的善，也要居安思危，正如薩斯教授提醒我們。

3. 人性的內在矛盾與自由的重要性

為何現代文明是如此脆弱呢？除了外在環境的限制，也有人性內在的因素。薩斯教授強調人類文明的兩個特點：一、生命都是互相關連的；二、人類能創造和使用工具去建立文化。對此我非常贊同，然而這也意味著，人類可以互相影響，而工具的不斷

改良使這種相互影響愈來愈巨大。但這些影響會是好的，還是壞的呢？

薩斯教授擺脫了自由主義者常有的樂觀主義，正視人性的陰暗面，這是我相當欣賞的。他多次提到該隱殺亞伯的故事，這揭示所有工具都容易被濫用，去作奸犯科、主宰、殺害甚或折磨別人。例子比比皆是：德國的集中營、南京大屠殺、史太林與毛澤東的暴政、波爾布特的屠殺等等。（Sass 2020，16）所以，有如蜜蜂有時會突然放棄牠們的地盤，導致牠們生活世界的崩潰，人們也會破壞自己的各種複雜社群，這就是人類的「文化崩潰症」（culture collapse disorder）。原因有很多，包括「不滿、憎恨、極端的意識形態、恐怖主義、剝削、廣泛的不快樂和失去互相信任」（Sass 2020，30）。

以上這點很重要，因為面對文明的危機，一些人認為只需要更發達的科技就可以解決。然而薩斯教授正確指出科技愈厲害，一旦被濫用的後果也愈發嚴重、可怕。因此，我們要擺脫自由主義的天真精神，正視人性內在的種種問題，並尋求合適的精神資源。

4. 經濟與快樂指數——超越享樂主義

薩斯教授也注意到這點，並批判經濟至上主義。他指出今天我們衡量社會的「進步」時，只考慮 GNP (Gross National Product)，他就參考不丹國王在 1972 年提出的 GHP (Gross Happiness Product) 的概念，認為衡量國家的好壞，不能只計算經濟成果，也要考慮文化的滿足、身體和情緒的健康、與環境的和諧、知識與靈性等。（Sass 2020，35）

我同意 GHP 的概念的確比只計算 GNP 好，但只考慮快樂足夠嗎？雖然 GHP 的概念包含性相當高，與一般的享樂主義有別。但「快樂」的語言還是以人類的主觀感受為中心，我認為要避開享樂主義的諸種問題，我們要重新提倡一個現代文明已逐漸拋棄的概念，就是在人的快樂之上存在著一個客觀且超越的道德秩序

(moral order)，比起人的快樂，或許人的品格或德性更重要。薩斯教授提到聯合國把 3 月 20 日定為國際快樂日，但我們卻從未聽聞國際品格日或國際德性日。

5. 回歸緊密群體和德性培育

我相信薩斯教授並不反對這點，他認為要防避未來的文明危機，我們不能過分倚賴龐大和統一的體制，而是需要增加這些體制內能獨立存在的單元（Modular body），這樣在面對危機和劇變時，我們能有更高靈活性，這些較小的社會單元也更容易適應、轉化和更新。

對此我也同意，但這只是策略性的考慮，我認為在面對未來危機，我們還是要在人性內在培育精神資源，重建人類的核心價值，而達成的途徑也無可避免倚賴一些緊密的群體（如家庭）。薩斯教授也指出：「健康家庭」是組成健康政體的基本元素。（Sass 2020，28）他結語時也訴諸中國文化，引用《道德經》強調修身和德行的培養，這我非常贊成。（Sass 2020，33）

緊密的群體、面對面的直接人際交流等都是好事，但這些交流不也可以被濫用和宰制嗎？當代社交媒體顯示，人們傾向圍爐取暖，只喜歡與價值觀相同的人交流，對價值觀不同的人就拉黑和斷絕來往！所以，無論是大群體和小群體，最需要的還是價值的培育，上面也提到現代文明需要更廣闊的目標。我認為一個關鍵，就是現代文明需要避免世俗主義的宰制，重新對一些包含超越領域的世界觀開放。格瑞爾也認為，過渡到後進步年代，我們要把大寫的人埋葬，容讓「有神論宗教的視角和實踐」，而科學也應重新對靈性開放。（Greer 2015，236 & 239）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 漢斯 - 馬丁·薩斯：〈冠狀病毒不但襲擊個體，還襲擊政體與團體〉，
《中外醫學哲學》，2020 年，第 XVIII 卷，第 2 期，頁 7-37。Sass,
Hans-Martin. “The Coronavirus also Attacks Political and Corporate
Bod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XVIII: 2 (2020), pp. 7-37.
- Greer, John Michael. *After Progress: Reason & Religion at the End of the
Industrial Age* (Gabriola Island, BC: New Society Publishers, 2015).